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08

■ 哲学思考

论《文子》德育思想^①

樊建武

(西安科技大学 思政部,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先秦道家重要著作《文子》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描述了道具有“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五个特性,提出“仁义为本”是治国之基、德政之要,指出德育是个体“虚心返初”和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提和基础。《文子》认为德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体道、悟道、得道、行道具有“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少”特点的圣人,提出了“明道知权”“智能兼备”的人才标准和“不以小恶妨大美”评价原则,并基于“自然”阐述了“无为而治”“不言之教”的育化方法,主张个体要“养形修身”,以养神为主做到淡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以养形为次做到“节”“适”“和”“便”,形成了系统的德育思想体系,推动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入理性轨道。

关键词:《文子》;德育思想;道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044-06

On the Morality Education Thoughts in *Wenzi*

FAN Jian - wu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partment,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Wenzi*, the important work of the pre-Qin Taoism, builds a bridge between doctrines and all living things on the earth, describes that doctrines are characterized by “nihility, plainness, tranquility, gentleness and pure simplicity”, proposes that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oriented” idea is both the base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the essence of benevolent ruling, and indicates that the morality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bringing an individual’s modesty back”, pursu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carrying out the benevolent ruling. *Wenzi* also states that the purpose of mor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the sages who can experience, comprehend, acquire and practise the doctrines, characterized by “small heart, big ambition, great wisdom, good manners, many capabilities and few troubles”. It proposes the talent standard of “knowing the doctrines and understand the authority” and “having both wisdom and capabilities”, and the evaluation principle of “possessing the virtues regardless of the tiny wickedness”. Based on the “nature”, it elaborates the educational method of “governing by doing nothing that goes against the nature” and “setting an example with people’s own conducts”, and advocates that an individual should “cultivate both body and mind”, i. e. giving priority to mind cultivation, people should show indifference to fame and wealth, seek modesty and peace, become gentle and humble, keep perfect and faithful, while giving minority to the body cultivation, people should reach the state with restraint, adequacy and convenience. All the above have helped to form the systematic morality education thought and to drive it to gradually get rid of mystery and to

① 收稿日期:2014-06-20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13A084);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2014Z71);西安市社科基金项目(14Z68)

作者简介:樊建武(1973-),男,陕西丹凤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先秦德育思想史研究。

step onto the rational track.

Key words: *Wenzi*; the morality education thought; doctrines

《文子》是先秦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关于其作者,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章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1]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有关《文子》的记载。唐代以后,《文子》是“驳书”“伪书”曾一度盛行,影响了人们对《文子》的关注和研究,削弱了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1973年,河北省定县出土了八角廊竹简残本《文子》,“驳书”“伪书”不仅不攻自破,而且使《文子》倍受重视,《文子》研究进入了新时期。《文子》在道家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以道为据,兼容他学,在推进思想融合的同时,对人进行了深入思考,构建了初具系统的德育主张,推进了中国德育思想逐步摆脱神秘而迈进理性轨道。

一 援气入道、顺道为德——基于本体的哲学基础

道是道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根基。老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生成、运动的源泉。“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吾不知其谁之子?象帝之先”^{[2]5}，“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56}道是有“物”、有“象”、有“精”的客观存在,在形态上具有“无状之状,无物之象”^{[2]16}的特点。“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25}在精神层面,道有情感、有意志,“天道无亲,常与善人。”^{[2]103}这里老子只指出了道的本根性,说明了道的形态和特点,却没有详细描述道生万物的过程,也没有讲清天地万物产生的原因,这就给人们在识道、悟道、顺道方面带来了障碍。作为老子思想的传承者,《文子》援气入道,发展老子的道论,为道家在根本上阐述道生万物奠定了基础。

《文子》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道生万物而不止、育万物而无穷,是万物生成和运动的源泉,“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万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恍兮忽兮,用不诎兮”^{[1]32}，“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赅，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朴，其散也，浑兮其若浊，浊而徐清，冲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汜兮若浮云，若无而有，若亡而存。”^{[1]42}和老子一样,《文子》也认为道无处不在、无形无声,只可述之、不可名之,“先天地生,惟象无形,不闻其声……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浊浊,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清。”^{[1]30}与老子不同,《文子》提出了“气”的概念,用气搭建了道与万物之间的桥梁,进一步解释了道生万物的原因和过程,认为气有阴阳,万物在阴阳的共同作用下而产生,指出“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精气为人,粗气为虫”^{[1]67}，“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1]166}，“万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宁”^{[1]102}。

《文子》特别强调道是“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门”^{[1]102},将道作为德的本源,从道与德的源流关系上昭示了道德思想的本体论意义。对于二者关系,《文子》进行了形象比喻,认为“夫道之与德,若韦之与革”^{[1]53},指出道是原材料皮革,德是可以加工成各种皮件的熟皮革。同时《文子》还指出“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复归于道,功名长久,终身无咎”^{[1]47},从而在肯定了道之德的本源后,又依次对德之本源作了逻辑的延伸,并对道德的发展进行了素朴的辩证法揭示,强调德来源于道又回归于道。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辩证逻辑复归。“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1]102}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一员,也由道生、被道育,人应该识道征、悟道性、遵道行、取道利,包括德育在内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应该以道为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道作为德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有没有具体特征,人们能否理解把握?老子认为,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2]1},没有详细说明具体特征。与老子不同,《文子》对“道之形象”从主体、本质、作用及其辩证致用进行了描述,“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虚无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静者道之鉴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纯粹素朴者道之干也。”^{[1]33}所以,一个人是否认识了道、理解了道、体悟了道,并遵道立德而行,关键看他的思想行为是否符合以上五项基本表征,这是《文子》对道家思想发展的另一重大贡献,不仅明确指出

人应该遵循道、顺从道,而且能够体会道、理解道,更重要的是指出了悟道、知道、顺道、体道基本要求和践行标准,使人的体道、得道之路更加具体、更可操作、更具现实性。

二 体道而静、仁义为本——基于人性的生成依据

道德属人。和同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文子》对人给予了高度关注和深刻思考,对人的认识和考量逐渐摆脱神秘色彩而迈入理性轨道,这正是其德育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文子》沿着老子“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30}的思路,重视人、尊重人,将人与道、天、地并列。《文子》承袭了老子“见素抱朴”^{[2]22}“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2]36}的自然思想,提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1]39},认为人、地、天、道因为具有“自然”这一共同特征而一气相通。以此为前提,《文子》强调天人一体、注重天人沟通,提出“人受天地变化而生”^{[1]68},是阴阳作用的产物,天人之间不仅存在必然联系而且相互感应,人的“精神本乎天,骨骼根于地”^{[1]67}，“天有四时、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雨寒暑,人有取与喜怒。胆为云,肺为气,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人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1]69}正是天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与感应决定了天道对人性的统摄,人应该努力象道一样“虚无、平易、清静、柔弱、纯粹素朴”^{[1]33}。所谓“虚无”,就是如囊籥一般,“虚而不屈,动而愈出”^{[2]17};所谓“平易”,就是一种“恬淡为上”^{[2]40}的大道情怀;所谓“清静”,就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2]34};所谓“柔弱”,就是如水一样,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2]57};所谓“纯粹素朴”,就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而达至“玄同”^{[2]73}境界。以上既是道的特征,也是人循道而行的基本要求。具体讲,就是要求人效法天道,做到“卑、退、俭、损”,“卑则尊,退则先,俭则广,损则大,此天道所成也。”^{[1]102}这样,《文子》以道为本体,勾画出天道与人道“一体论”的理论图示,这既为人做了道德要求的价值规范,又为对人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理论预设和实践期待。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文子》指出“民知书则德衰,知数而仁衰”^{[1]133},认为人类一方面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逐渐摆脱了愚昧无知而日趋明智,另一方面,人类的发展是一个从淳朴到诈伪、从宁静到躁乱、从和顺到智巧的由善变恶过程,人类固有的自然纯朴之性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失落、丧失,甚至产生智巧险恶之性。因此,《文子》提出要推行教化,使人知道仁义廉耻和理解道德真谛,从而促使人自觉向善,不断加强个体修养,切实认同和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绝弃弊习陋俗和贪念私欲,“非修礼义廉耻不立,民无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礼义法不能正。”^{[1]209}《文子》指出“人生而静,天之性也”^{[1]39},认为人生下来是纯静、真朴的,只是因后天影响发生了不同变化。这种“性静论”作为一家之言与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并立,虽然对人之先天本性剖析不同,但殊途同归,在人的后天形成的内在品德和道德教育的认识上达成了一致。这就赋予了《文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前提,成为《文子》道德教育的存在根基。

《文子》认为,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等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道的要求体现为以“仁义”为本,这是实施德育的现实依据。《文子》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基础,“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国之基也。”^{[1]182}老百姓与国家的关系“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1]191},如果失去了老百姓的支持,国家就会失去生存、发展的根本。所以,治国理政、处理社会关系就要遵循天道、体道而行,“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尽行之天下服,服则怀之。”^{[1]102}否则,背道而行,执坚强而不知柔弱,挥霍无度,作难结怨,挑起事端,骄横放肆,恣意妄为,小人这样则身受其害,大人这样则国家灭亡,浅了会伤害自己,深了会殃及子孙后代。所以,“罪莫大于无道,怨莫深于无德”^{[1]103},只有体道顺民,以“仁义”为本,广泛推行道德教化才能保证国家社会根基的稳固。《文子》强调仁义是“治之本”^{[1]190}“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1]140},指出“仁义者,广崇也”^{[1]191},认为如果不增加它的厚度而一味扩张使用便会损毁,不巩固扩大它的基础而只增加它的崇高必然会倾覆,“故不大其栋,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栋,任国莫若德”^{[1]19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仁义与儒家提出的仁义有本质区别,这种仁义不是约束人的伦理道德,而是体道而行、顺从民意的必然要求。在这里,“仁”是人兼爱无私的本性体现,“义”由人素朴纯真的本性而生,是顺乎人性的“情”的本能反应。“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爱之愈笃者,情也。”^{[1]162}《文子》强调保持这种慈母对婴儿的情是施行的仁义的关键,最直接的作为就是始终坚持爱民有道,实施爱

民、利民、富民的措施,“其惨怛于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1]183},如果君主能够坚守爱民之道,就一定能够保住国家的命脉与根基。

三 从道治身、德正天下——基于治国的价值功用

《文子》指出“故乱国之主,务于广地,而不务于仁义,务于高位,而不务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1]185},将是否务修道德上升到国之存亡的高度,并进一步提出治国之本在于治身,主张治国要以道德、仁义、礼智为纲,同时认为因施行程度不同而作用会不相同,“深行之谓之道德,浅行之谓之仁义,薄行之谓之礼智。”^{[1]185}“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义即正一国,修礼智即正一乡。”^{[1]185}这是《文子》主张道德教育的政治出发点,由此逻辑地引申出德育的现实功用在于它是推行德仁义礼、实施德政的前提和基础,是个体虚心体道、返初归本的内在要求和实现途径。

《文子》认为道德教化对人性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德育可以将人性的善由可能转化成现实,并作用于社会,使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与道相符,为推行德政奠定基础。否则,“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1]105}这是对道德教育缺失导致的必然后果的认知判断,从而依“反证法”佐证道德教育对治国的极端重要性,这充分说明《文子》已具有开展道德教育的理性自觉。

在强调外部教化的同时,《文子》注重个人内在修养的重要作用,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就会“返初”而恢复自然本性,“心反其初,则民性善。”^{[1]167}“返初”的关键在于对道的认识和体悟,这既是基本要求又是必然途径,“不闻道者,无以返性”^{[1]166},“至人之学也,欲以反性于无,游心于虚。”^{[1]206}只有研习大道、克己去欲、虚静体悟,就会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虚无境界,成为性善圣人。当然,《文子》也认为这些并不一定会给个人带来现实利益,指出“道不可以劝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1]189},“道不可以进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1]190},甚至认为“君子能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为非而未必免于祸”^{[1]197}。《文子》主张每一个向善的人都必须应“修足誉之德,不求人之誉己”^{[1]188},自觉修养品行,“乐德而忘贱,故名不动心;乐道而忘贫,故利不动心。是以谦而能乐,静而能澹”^{[1]195},以得失皆由道的平和心态看待一切名利,一心仰望自己心目中的道德世界,“治世即以义卫身,世乱即以身卫义,死之日,行之终也”^{[1]197},真正做到安贫乐道、舍生从道。

四 明道知权、智能兼备——基于现实的人格评判

《文子》的德育目标是培养体道、悟道、得道、行道的圣人,这一理想人格至少具有“心小、志大、智圆、行方、能多、事少”^{[1]136}等特征。心小是要谨小慎微、寡欲清心,志大是要心怀天下、造福四方;智圆是要智慧明达、永不枯竭;行方是要品行正直、穷达不易;能多是要文武兼备、举措得宜;事少是要处事执道守约、事半功多。这其中既有品行要求,又有智能标准;既关注智力因素,又关注非智力因素;既关心个性发展、潜能发掘,又强调社会要求、提倡胸怀大志,增长智能,加强修养,锤炼品行,努力以事半功多实现安邦定国,这就是圣人标准。

但是,《文子》发现,圣人标准在现实中很难达到,于是从实际出发对德育目标进行了分层,从人的认知能力角度将人分为圣人、智人、愚人三种水平。“闻而知之,圣也;见而知之,智也。故圣人常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智者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圣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祸福所生;智者先见成形,故知祸福之门。闻未生,圣也;先见成形,智也;无闻见者,愚迷。”^{[1]105}圣人是具有先知能力能够依据天道而行的人,智人是能够依据经验而知如何处事的人,愚人则是指不具有自觉认知能力的人。这种“分层说”符合教育对人培养的内在规律,它以尊重客观事实为根据,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留下了教育发展的空间和张力。

这三类人中,圣人与智人的区别在于能否“明”道。“听视聪达谓之明”^{[1]170},有明而智为圣,无明而智为智。圣人明道,可以“以听无不闻,以视无不见,以为无不成,患祸无由入,邪气不能袭”^{[1]170},“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弱能强,随时动静,因资而立功,睹物住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变。”^{[1]135}智人不是明而知之,而是见而知之,只能通过观察辨别才能厘清何为善恶、何为忠奸,并以此为据进行选择舍弃,因此“智”不如“圣”。智人与愚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能否知“权”,“夫权者,圣人所以独见。夫先迁而后合者,

之谓权;先合而后迁者,不知权。不知权者,善反丑矣。”^{[1]111}《文子》认为非圣人不能明道,不明道就不了解道的内涵和要求,不了解道的内涵和要求就难以坚守人的自然素朴本性而被身外之物和欲望名利所干扰蒙蔽,从而猎求音色美味。如果事先能“权”,即根据时和势判断是非曲直、善恶好坏,依据是否符合德仁义礼要求而决定行为取舍,便会弃欲舍利、明心守清,保持智,否则,将沦为愚迷之人。《文子》指出,“权”首要的是知时而变,“夫事生者,应变而动。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1]38}时间不同,环境要素就不同,人必须通过“权”来分析判断,做符合德、仁、义、礼的事,从而最终以顺道,这正是“先迁而后合者”^{[1]111}。所以说,智人必须知权、会权、能权,知道何时何事是与德相背、与道相违的。可见,“权”既是人们实现仁义礼德的重要方法,也是体道、悟道的基础环节,其目的是力求得道、行道。

在现实社会中,能像圣人一样得道而自觉行道的人只是极个别,能够达到智人标准已经很不容易了,而在智人层面仍然因人分层。如何评价智人的层次水平,《文子》提出“无德不尊,无能不官”^{[1]187},认为只有德能兼备才是合格智人,主张以德和能作为衡量智人水平的主要标准,“以仁义为本而后立,智能并行,圣人以仁义为准绳,中绳者谓之君子,不中绳者谓之小人”^{[1]199},“不归善者不为君子”^{[1]199}。可见,在《文子》看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终归宿,也是一个人必须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文子》同时指出,仅具备高尚品德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应时权变,见形施宜”“论世立法,随时举事”^{[1]109}的能力,否则便会因不能把握规律而导致身死国亡,“故知仁义而不知世权者,不达于道也。”^{[1]138}所以,合格的人应“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与物推移,万举而不蹈”^{[1]138},既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又能与时俱变、自如应对各种境况。

对于人的评价,《文子》指出“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也”^{[1]197},认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评价一个人的德能应看其主流,要将人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观察他的反应与变化,“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施,穷即观其所受,贱即观其所为,视其所患难,以知其所勇,动以喜乐,以观其守,委以货财,以观其仁,振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则人情可得矣。”^{[1]198}在人才选拔上,《文子》强调“人有厚德,无问其小节,人有大誉,无疵其小故。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以为累也”^{[1]197}。认为如果心胸狭窄,眼光短浅,拘守成规,就可能将优秀人才拒之千里。在人的任用上,应扬优避劣,因性而评,因才而用,志人所长,忘人所短,“不以小恶妨大美”^{[1]198},只要有一定的德能,就应根据他的个性特点分配给不同的职事,“有一功者处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胜其任……故人无弃人,物无弃材。”^{[1]157}这充分体现了道家思想心胸宽广、虚怀若谷、兼容并包的博大度。

五 教之以道、导之以德——基于自然的育化方略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2]85},这是道家关于人实践活动的基本原则。《文子》也主张“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1]33},认为人与万物,同生于道,同归于自然,所以包括育人在内的人的所有活动都要效法天地之道而顺应自然,指出“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1]148},“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1]148},主张“以导民之心,各使自然”^{[1]48}。这里的“自然”不能理解为无所作为的只强调自然作用的“自然主义”,而是强调人的教育活动应顺应教育活动的内在规律。这一理念在《文子》的德育方略中进一步得到彰显。

《文子》认为,自然首先要无为,自然而然地处理好教与被教的关系,以无为实现无不治,“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1]33}无为体现在德育方法上就是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行不言之教。具体讲,一是顺应人性,根据人的身心特点开展教育活动。“执道以御民者,事来而循之,物动而因之。万物之化,无不应也,百事之变,无不耦也。”^{[1]33}“圣人在上,怀道而不言,泽及万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1]52}二是要求施教者心怀天道,以至诚之心感化受教者,以不言之教引导受教者扬善隐恶,实现“不下堂而行四海,变易习俗,民化迁善,若出诸己,能以神化者也”^{[1]51}。三是注重言行,做好榜样,以榜样引导受教者,“民之化上,不从其言,从其所行”^{[1]59},“禁胜于身,即令行于民”^{[1]95}。这也就充分表明《文子》认为施教者在教育过程中既不能只当传声筒,又不能耳提面命、强行说教和上下训教,而是要在体道的基础上,怀着真诚和崇仰来感化和引导受教者,做到春风化雨,达到潜

移默化。

另一方面,自然表现在个体的自觉自化上就是要加强身心修养。《文子》认为“夫形者,生之舍也”^{[1]81},指出身心修养的前提和基础是养形,养形的目的在于“内在己者”“邪气无由入”,主要方法是“节”“适”“和”“便”^{[1]92},基本要求是坐卧有节、饮食有度、喜怒和谐、动静和顺^{[1]88}。在养形的同时,《文子》认为形为神的处所,神为形的统帅。以神制形百利无害,因形损神不会长久,指出“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主者神从而害”^{[1]82}。《文子》强调身心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养神,其次才是养形,指出“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供嗜欲,养生之末也”^{[1]61}。这就告诉人们身心修养不可本末倒置,一定要重精神境界的升华、轻耳目之欲的满足,做到淡泊寡欲、致虚守静、柔弱谦卑、守精保真^{[3]37}。

淡泊寡欲就是要不贪享乐、不计名利。《文子》认为人生最大的祸害莫过于多欲这股“邪气”的侵扰,它蒙蔽人的身心,使人难以预测祸福,“推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1]92}，“故耳目淫于声色,即五藏动摇而不动,血气滔荡而不休,精神驰骋而不守,祸福之至虽如立山,无由识之矣。”^{[1]71}如果能少欲宁静,“即观乎往世之外,来世之内,祸福之间,可足见也。”^{[1]71}《文子》反对争名逐利,认为名利之心会妨害道德修养,指出一个人如果贪图名利、邀功取宠,就会不顾一切地违背常理而胡作非为,最终导致身败名裂,“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见誉而为善,立名而为贤,即治不顺理而事不顺时,治不顺理则多责,事不顺时则无功,妄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责,事败足以灭身。”^{[1]85}《文子》提出“非淡漠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断”^{[1]76},要求人“安贫乐道,不以欲伤生,不以利累己”^{[1]187}。

致虚守静就是要平心静气,摒弃杂念。《文子》指出,“清虚者,天之明也……虚静之道,天长地久,神微周盈,于物无宰”^{[1]46}，“静漠者神明之宅,虚无者道之所居。”^{[1]68}达到虚静的境界,一方面要去哀乐、喜怒、好憎,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保持良好的修养心态。“夫哀乐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过。”^{[1]72}另一方面要去除与体道无关的杂念,精神专一,使心灵若清水映物一样明晰,实现道体合一。“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金玉之音者,目不见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则大有所忘。”^{[1]77}

柔弱谦卑就是退守不争、谦虚不骄。《文子》指出只有柔弱谦卑才能高远强大,“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损弊故突坚,自亏缺故盛全,处浊辱故新鲜,见不足故能贤”^{[1]189}，“柔者,道之刚也;弱者,道之强也。”^{[1]34}《文子》认为只有无为不争、退守柔弱、保持卑谦才可能积少成多、积弱成强。“清静辞让者见下也,虚心无有者见不足也,见下故能致其高,见不足故能成其贤。矜者不立,奢者不长,强梁者死,满日者亡。”^{[1]79}只有柔弱谦卑才能静心修身养性、取得进步、发展自身。《文子》告诫“聪明广智守以愚,多闻博辩守以俭,武力勇敢守以畏,富贵广大守以狭,德施天下守以让……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1]80},永远虚心谦卑才能不断进步发展。

守精保真就是要坚守精气、保持纯朴。《文子》指出“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亏其身”^{[1]51},认为人本性纯真质朴,但随着人欲膨胀其性会逐渐丧失。因此道德修养过程要重存养、保真性,专一于心意而守住精气和神明。“神明藏于无形,精气反于真,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于目即其视明,存于耳即其听聪,留于口即其言当,集于心即其虑通。”^{[1]171}要切实排除外界干扰,达到“心意专于内,通达祸福于一,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不学而知,弗视而见,弗为而成,弗治而辩”^{[1]83}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文子要论[M]. 李定生,徐慧君,校注.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
- [2] 张默生. 老子章句新释[M]. 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8.
- [3] 陈德安. 中国道家道教教育思想史(先秦至隋唐卷)[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王小飞)